

日韓戰略性接近：動因、態勢及其限度

孫家珮（北京） 張 勇（北京）

【摘要】美國為在東亞謀求戰略優勢，調動盟友力量在多條戰綫綜合開展對華制衡。在美日韓戰略需求的推動下，日韓首腦互訪重啓“穿梭外交”，三邊首腦多次會晤，開啓了兩國戰略性接近的新局面。日韓戰略性接近與美遏華戰略形成共振，對華政策消極性增加。長期來看，日韓關係前景仍面臨歷史和解、戰略需求和實力對比等挑戰。本輪日韓關係改善動力主要源於戰略需求層面，戰略性接近并非意味著兩國關係的深度和解，日韓雙邊關係內生的局限性無法破解，“積極合作”難以通往“深度結盟”。美日韓三邊關係在持續影響東亞安全環境及國際格局演變同時也面臨著包括牽連風險、承諾難題以及利益分歧的發展困境。

【關鍵詞】日韓關係；戰略性接近；美日韓三邊關係；東亞安全

自 1951 年《舊金山和約》簽訂後，作為美國重構二戰後國際秩序的一環，日韓關係在美國的斡旋下得以修復。日本從 1951 年起與韓國開始了旨在建立正常邦交關係的日韓會談，但李承晚政權時期對日本採取強硬政策，致使日韓關係難以修復。1961 年朴正熙上台，在外交層面積極向日本釋放善意。1965 年日韓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日韓兩國開啓關係正常化時代。日韓邦交正常化後兩國關係雖有一定的緩和與改善跡象，但仍存在結構性矛盾。圍繞歷史問題、經貿摩擦、領土爭端等矛盾未能有效解決，兩國關係波蕩起伏、陷入相互對立的惡性循環。無論是 1998 年金大中小淵惠三面向 21 世紀的共同宣言，亦或是 2015 年朴槿惠和安倍晉三圍繞慰安婦問題的協議，上一階段的關係緩和無法為下一階段的徹底和解提供基礎。特別是文在寅執政 5 年期間，日韓兩國關係逐漸走低。

在日韓關係的低谷期，美國也面臨著同盟管理的兩難困境。美日同盟和美韓同盟是美國亞太

安全體系布局中的兩個重要支柱，美國在美日韓三邊關係中處於絕對的領導地位。美國致力於實現美日韓三邊同盟關係，美日同盟與美韓同盟是穩定持續的，但與之相比日韓關係波折起伏，嚴重影響了其在亞太的戰略安排。因此，對於美國而言，本次日韓戰略性接近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當前在美國加強遏華背景下，為尋求在國際秩序變革中占據有利位置，日韓關係在美國的推動下得以修復。與日本接近成為韓國謀求影響國際秩序重塑的重要一環，這也得到了日本的積極回應，兩國加快關係調整步伐，雙方戰略性接近態勢愈發明顯。除美國因素外，在日韓自身戰略需求的推動下，兩國關係迎來較大改善。就日韓關係改善的歷史而言，總體存在二戰後的“恢復和平”、面向 21 世紀的“積極合作”以及未來潛在的“深度和解”三種態勢，但日韓關係本輪改善仍停留在“積極合作”階段，其突出特點就是“戰略性”，是兩國基於外部因素和自身戰略需求的戰略層面接近，這種“戰略性”接近并非兩國“實

質性”的深度和解或結盟，是基於外部環境和內部因素下的妥協。

一、戰略性接近的內外動因

本輪日韓關係改善，既有內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就外部因素而言，在中美博弈和俄烏衝突疊加影響不斷深化的背景下，日韓不斷調整雙邊關係，追隨美國對華戰略制衡。就內部因素而言，源於日韓為發展軍備增強國家實力自身戰略轉型需求下的驅動，但日韓追求增強國家實力呈常態化態勢，是長期且持續的。因而，本輪日韓接近的外部因素大於內部因素，導致兩國關係改善停留在戰略性接近層面。

（一）俄烏衝突：助推日韓戰略轉型

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烏衝突爆發以來，中美戰略博弈不斷升級並進入戰略僵持期，俄烏衝突所帶來的影響不僅局限於歐洲，對東亞安全格局也產生重要影響。美國藉勢俄烏衝突更加積極推行針對中國的“印太戰略”，謀求對華制衡並遏制中國崛起；日本把衝突視為國際戰略博弈的重要契機，力圖加速戰略轉型，撬動戰後國際秩序。俄烏衝突不久後岸田文雄於 2022 年 5 月訪問英國時聲稱“今天烏克蘭就是明日的東亞”^[1]。日本調整了以往的對俄政策，追隨歐美國家加入對俄制裁行列，中美戰略競爭與俄烏衝突一道促使美日韓進一步強化安全合作，三國多次在韓國東部海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

隨著俄烏衝突朝著長期化方向發展，亞太集團對抗的傾向增強。日韓兩國“戰略性借用”俄烏衝突實現自身戰略轉型：一是強化自身安全軍事實力與國際戰略行為能力；二是強化美日、美韓同盟框架下的軍事合作與戰略協同；三是強化所謂民主國家志同道合者聯盟，構建廣域盟伴網絡，日韓聯手美國在亞太打造所謂的“美日韓”

和“中朝俄”的陣營對立態勢。2023 年 3 月，岸田文雄突訪烏克蘭，成為日本二戰後首位出訪在戰事與衝突中國家的首相。2023 年 5 月七國集團廣島峰會期間，尹錫悅同澤連斯基舉行雙邊會談，承諾迅速援助烏克蘭必需的掃雷裝備、救護車等物資，日韓對烏克蘭示好姿態明顯。

（二）美國因素：利用日韓介入亞太事務

二戰後美國始終試圖主導亞太安全秩序，美日同盟和美韓同盟都是在 1950 年代冷戰開始之際建立，1951 年的美日安保條約和 1953 年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都是美國構建地區秩序的重要一環。作為影響日韓關係的關鍵第三方，美國為日韓戰略性接近創造了外部條件。2021 年拜登上台後，對特朗普的政策做出了某些調整，強化對盟友的拉攏力度，在軍事安全領域組建美英澳（AUKUS）三邊夥伴關係，在情報領域完善“五眼聯盟”，升級四邊機制（QUAD），依靠建立小多邊體系加大遏華力度。

在俄烏衝突爆發後，美國為保持對亞太盟友的領導力和戰略信譽，將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美國決心把亞太作為制衡中國的主戰場，對華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意識形態等領域的戰略競爭。日韓在地區安全和戰略博弈中得到了美國更多的鼓勵和授權，三邊安全關係呈升溫趨勢。2023 年美日韓在距離獨島（日本稱“竹島”）150 公里以外的海域共同開展了針對朝鮮的反潛聯演，這也是三國時隔 5 年再次舉行以反潛為主題的聯合軍事演習。^[2]在意識形態領域，2023 年 3 月，所謂第三屆“民主峰會”在韓國首爾舉行。美國之所以選擇韓國作為第三屆峰會主辦國意圖明顯，當前國際局勢不僅促進了日韓合作，還促使美國通過加強雙邊、三邊安全合作來介入東亞事務。

（三）朝核因素：日韓對彼此戰略需求提升朝核問題始終是影響日韓關係的關鍵因素，

1998年8月朝鮮試射大浦洞1號導彈，飛越日本領空，使日本深感威脅。該事件成為日韓關係第一輪改善的重要契機，時任日本首相小淵惠三邀請韓國總統金大中訪日，兩國關係開啓了新局面。當前半島安全局勢向複雜化發展，日韓對彼此的戰略需求因此而提升。在美朝核談、朝韓對話中斷和朝鮮被日益孤立的三重困境之下，朝鮮半島的安全戰略形勢、和平進程變數增加。日韓國內普遍認為，朝鮮核試驗具有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美韓發布《華盛頓宣言》緩解韓國內不安情緒，由此創設全新的協商機制“核咨商小組”（NCG），在韓國持續承諾不自主研發核武器的條件下，美國加強對其提供延伸威懾的力度。^[3]

尹錫悅上台後改變了文在寅政府追求構築繁榮統一的朝鮮半島政策，岸田政府則延續安倍路線，將朝鮮塑造成為加強軍備以應對“外部威脅”的工具。所謂“朝鮮威脅”成為美國在亞太制衡中俄的藉口，為日韓在美國協助下構建本國的導彈防禦體系提供了機會。美日韓就應對朝鮮形成統一步調，於2022年5月發布三國外長聲明，強調安全合作及對朝威懾、持續推動朝鮮問題國際化。^[4]朝鮮受到來自美日韓的軍事壓力越大，就越難以棄核，朝核局勢對美日韓安全合作的助推作用明顯。

（四）日本因素：配合美國遏華戰略

冷戰後，日美同盟不斷擴大適用範圍，日美同盟從最初的專守防衛擴大到“周邊事態”，再到“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中國始終是日美同盟調整中的重要因素。近年來日本“綜合戰略活躍度”空前提升，岸田內閣上台後，日本強化日美同盟，積極支持拜登政府強化“印太”戰略存在及對華競爭態勢。日本不斷將“美日+”合作模式從東北亞擴展至其他地區。日本於2022年底通過了《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防衛力量整頓計劃》

新安保三文件，將中國定義為“迄今為止最大戰略挑戰”。2023年6月，日美舉行防務磋商，宣稱將與美韓等國進一步加強合作，以應對中國和俄羅斯所謂“單方面改變現狀”。^[5]岸田內閣為鞏固與美同盟、爭取美方支持，將自身納入美國制華戰略軌道的同時向韓國釋放積極信號。

日本積極參與中美圍繞外交和安全、經濟和技術、價值和規範的競爭，並強調通過美國主導的“自由開放的印太”加強同韓國合作改變這一局面。日本與北約積極強化防務合作，擴大與其在情報共享、聯合演訓、裝備聯合研發等領域的實質性合作，日本與北約將在網絡防禦等領域深化合作關係，並計劃在東京開設聯絡處。^[6]支持北約的亞太化，與其攜手干預地區安全事務。

（五）尹錫悅執政：戰略平衡轉向親美保守

日韓最高決策者在推動兩國政府層面的戰略性接近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二十世紀以來，韓國力圖在中美之間尋求戰略平衡，外交政策長期保持“戰略模糊”態勢，雖然奉行親美的外交政策符合保守派的政治訴求，但尹錫悅政權卻帶有更加濃厚的親美色彩。2022年5月10日，尹錫悅以微弱優勢在第20屆韓國總統競選中當選。早在選舉期間，尹錫悅外交團隊便提出美日韓三邊合作格局不能因歷史等問題受阻。尹錫悅表示會走“親美”路線，包括在軍事安全方面繼續與美國緊密合作。尹錫悅曾表示，不需要被不在韓國追加部署薩德、不參加美國導彈防禦網、不締結美日韓三國軍事同盟的“三不”承諾所束縛。勝選後，尹錫悅政府把美國視為重要的盟友和夥伴。對日政策方面，尹錫悅與岸田文雄在電話會談中就努力改善兩國關係達成共識。

尹錫悅將韓國定位為“全球中樞國家”，主張對外戰略要更具全球視野，在國際社會發揮作用。2022年12月28日，韓國政府公布了韓國版“印

太”戰略，這一新戰略主張擺脫以往重視韓朝關係、聚焦半島問題的外交政策，呼籲韓國作為“全球中樞國家”發揮新的地區作用。尹錫悅政府主張以大膽的外交和強有力的安保為基礎，繼續深化與美國的經濟和政治聯繫，將合作擴大到朝鮮半島以外，以應對更多的地區和全球挑戰。

二、戰略性接近的總體態勢

日韓雙方在首腦會談前就為改善兩國關係創造條件，兩國外交部門以應對朝鮮核導問題為由推動恢復安全對話，並圍繞“慰安婦”“強徵勞工”等歷史問題、日本對韓出口管制等經貿問題進行預先磋商，達成初步解決方案。尹錫悅認為“必須切斷韓日對立的惡性循環”^[7]。岸田亦表示將積極推動改善日韓關係。在改善兩國關係上，日韓均持積極態度。日韓從過去以所謂朝鮮威脅為焦點的合作，升級為構建整個“印太地區”自由與和平的“泛地區合作機制”，合作領域將不局限於安全領域，還涵蓋經濟、尖端技術和人員交流等方面。

（一）首腦“穿梭外交”和各層級對話機制形成

日韓首腦“穿梭外交”最初由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和盧武鉉於2004年共同商定，因小泉參拜靖國神社而中斷，2008年韓國總統李明博和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一度恢復，因歷史和領土問題再度中斷。2011年10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和李明博再度恢復，但因領土問題中斷12年之久。本次日韓重啟首腦“穿梭外交”，實現了互訪。2023年3月16至17日，尹錫悅訪日與岸田文雄會談，開啓了日韓戰略性接近的新局面。僅時隔50餘天，5月7日至8日，岸田文雄訪韓。^[8]上次以“穿梭外交”形式訪韓則是野田佳彥2011年10月的出訪。岸田邀請尹錫悅出席七國集團廣島峰會的

擴大會議。另外，日韓宣布將重啟兩國財政、貿易、科技等部門的部長級會談，就雙邊關係中的重大與敏感問題進行磋商。兩國同意通過美日同盟、美韓同盟、雙邊及三邊安全合作加強遏制力和應對力。首腦會談決定在推行韓國“自由、繁榮、和平的印太戰略”和日本“自由而開放的印太戰略”的過程中保持密切合作與溝通。^[9]在首腦“穿梭外交”的牽引下，日韓雙邊對話機制有望全面恢復，戰略溝通狀況有所改善。廣島峰會期間，岸田文雄與尹錫悅、拜登舉行三國首腦會談。日韓與美國對華制衡戰略形成更強策應、聯動的新高度，兩國傾向於聯手應對“外部威脅”，減少摩擦，增加合作。在拜登的推動下美日韓三國合作機制逐漸形成，2023年8月18日在美國戴維營舉行三國首腦會議上簽署《戴維營精神：日韓美聯合聲明》《戴維營原則》《協商約定》三份文件，組建由三國參與的地區安全合作機制。^[10]美國藉勢開展戰略外交，力圖實現三邊結盟，推動北約介入東亞事務。

（二）以“朝鮮威脅”為由重啟軍事安全合作

日韓安全合作是兩國關係發展的重要方面，具有高度敏感性。日韓在首腦會談上譴責朝鮮發射彈道導彈，強調“更緊密開展安全合作”並強化美日韓安全合作。安全對話方面，日韓明確重啟中斷5年的部長級安全對話，並重啟副外長級戰略對話，修復外交與防務部門間政策協調。另外，兩國決定恢復實施2019年中斷的《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加強以朝鮮半島為重點的軍事情報共享。日韓還決定在此前聯合舉行反潛演習的基礎上，繼續開展反導反潛、海上救助聯合演習，並改善兩國海軍因2018年“火控雷達照射事件”^[11]惡化的關係。2023年4月，日美韓實施三國海上聯合演訓。日本海上自衛隊“愛宕”號和美韓兩國海軍的驅逐

艦參加了此次演習，訓練設定了朝鮮彈道導彈瞄準的模擬目標，確認了日美韓展開探測、追蹤和情報共享的流程。同一天，日韓 2+2 司局級外交安全對話時隔 5 年重啓，雙方就朝鮮半島乃至東北亞安全局勢、兩國安全政策合作現狀與未來發展方向、合力應對朝核問題等事宜交換意見。同年 10 月，以涉朝問題的日韓副外長級戰略對話時隔 9 年重啓，雙方就朝鮮在軍事上與俄羅斯加強關係交換意見。^[12]以應對朝鮮“安全威脅”為名的日韓軍事合作成為驅動兩國戰略性接近的重要動力。

（三）聯手構建產業供應鏈以改善兩國經貿關係

日韓經貿關係是兩國關係的晴雨表，日韓經貿摩擦的實質是兩國政治和外交較量的延伸，全球產業鏈升級和分工調整加劇了日韓經濟的競爭面。兩國戰略性接近以來，日本政府宣布解除 2019 年起實施的對韓半導體材料出口管制措施，并把韓國重新列為出口管理上享受優惠措施的“白名單國家”。韓國亦表示將撤回在世界貿易組織針對日本的訴訟。日韓有意將擴大經貿并促進相互投資，新設日韓經濟安全磋商機制，共同應對國際能源危機，深化半導體技術合作，構建“具有韌性的”產業供應鏈。在日韓政府推動下，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與韓國“全國經濟人聯合會”將分別創設“未來夥伴關係基金”，支持兩國能源、新興技術等領域的民間經濟項目與青年交流項目。兩國將在太空、量子、人工智能（AI）、數碼生物、未來材料等尖端科學技術領域的共同研發以及半導體供應鏈的構建上加強合作。在上述措施的推動下，一度低迷的日韓經貿關係有望恢復，圍繞能源、半導體的經濟安全問題將成為重點合作領域。

三、戰略性接近的外溢影響

日韓通過首腦“穿梭外交”改善雙邊關係。在各自利益驅動及美國牽引下，兩國戰略性接近的態勢凸顯，并與美國形成更強三方戰略聯動。日韓更加積極迎合美國主導的遏華戰略，兩國政界對華政策中的消極性將有所增強。但也應看到，日韓此輪關係改善基礎仍不牢固，兩國關係仍存在“回擺”的可能。

（一）日韓政界對華政策消極性增強

總體上，日韓目前仍維持對華協調政策，但與美國制華戰略布局的響應配合趨向加強，在外交、軍事安全上日益主張對中國保持強硬姿態。目前，岸田政府更主張與美方“戰略綁定”，對華外交的消極性持續增強，在日韓戰略性接近的態勢下，兩國介入台海的行為和方式逐步趨同，2022 年 8 月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竄訪台灣後相繼到訪日本、韓國，韓國外交部禮賓人員和國會官員都沒有到場，可以看到在尹錫悅執政初期，韓國和日本在涉華核心利益問題的應對上存在一定差異，但隨著日韓關係的逐步改善，韓國在台海問題上的表態呈現向日美趨同的態勢。2024 年 1 月，美國發表美日韓“印太對話”聯合聲明，重申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對國際社會的安全與繁榮不可或缺。^[13]同年 5 月，韓國國民力量黨國會議員趙慶泰等竄訪中國台灣地區，出席所謂“領導人就職儀式”并會見有關人員，做出同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背道而馳的舉動，進一步影響兩國關係的發展。

（二）陣營對抗風險衝擊亞太安全環境

日韓關係改善是美日韓三邊合作實施的前提，美日同盟和美韓同盟兩大同盟體系的戰略接近，是美國拉北約入亞太的進一步表現。美國致力於重新強化美日韓三邊，并利用韓國積極參與“印太”戰略，打通美日韓三邊與美日印澳多邊以及

美國在亞洲與歐洲盟友體系之間的聯絡與合作，並使其進一步聚焦對華遏制，形成合力。三國在應對中國方面加強協調與合作，固化了東北亞地區尚未消除的冷戰結構，重構了地區安全對話平台。同時，美日韓聯合對朝強硬施壓，將誘導朝鮮進一步強化核打擊能力，勢必增大中國周邊安全風險、直接衝擊區域軍控與防擴散體制。另外，日韓將各自在半導體材料設備及製程技術上的優勢相互結合，加強半導體技術及產業鏈合作，為美國加強對華半導體封鎖提供了更有利條件，對亞太地區自由公平的貿易環境也將造成一定不利影響。

（三）日韓關係改善給中日韓合作帶來契機

日韓戰略性接近態勢今後仍有升溫、強化的趨勢，其對華政策具有一定的戰略趨同性。儘管“戰略性接近”在安全上的涉我性與消極性均在增強，但隨著日韓關係的改善，中日韓開展合作的必要性與可行性也在提升。日韓雙邊陷入低谷後的關係改善給中日韓三邊合作帶來可能，2024年5月，國務院總理李強在首爾與韓國總統尹錫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第九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14]三邊致力於建立健全民間經濟、新興產業、金融政策等對話機制。致力於促進可持續發展，加強氣候變化、老齡化、低碳轉型等領域交流合作。雙邊關係改善同時也給經濟上的“中日韓”對衝軍事上的“美日韓”帶來一定契機和可能性。

四、戰略性接近的限度和困境

當前日韓關係走出困局並走向正常化，兩國關係的對立結構正發生深層變化，但日韓戰略性接近並不意味著美日韓三國進入真正的同盟狀態。美日韓“結盟”的基礎仍相當薄弱，未來不確定性較大，仍面臨成本分攤、牽連風險的困境。美日同盟和美韓同盟是美國推動北約“亞太化”的

基礎，但同時日本和韓國存在“戰略自主”需求。美日韓三國的國家利益並不完全一致，日韓戰略性接近的背後，仍存在錯綜複雜的局面和發生變數的可能。

（一）對華政策取向差異導致的目標困境

當前面對中國的崛起，在亞太區域內，總體而言美國明確採取的是“競爭”（competition）的姿態，日本主要是採取“制衡”（balancing）的做法，而韓國基本採取“對衝”（hedging）的方式。美國和日本把中國的崛起當成它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甚至假想敵，但韓國沒有明確把中國看作假想敵和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在美日同盟企圖介入台海的背景下，韓國擔心捲入台海衝突。日本也擔心被捲入朝鮮半島的紛爭。美國在日韓關係中採取的是“非中立”的立場，在推動日韓接近的同時往往更偏袒日本。因而形成了“韓國比日本更擔心被美國拋棄，而日本比韓國更擔心被捲入一場紛爭”態勢。^[15]

韓國國內對於在所謂的“新冷戰”中選邊站的態度曖昧，並不完全追隨美日將中國定義為最大挑戰甚至威脅。但面對中美競爭，韓國維持與中美外交均衡的難度不斷加大。當前韓國經濟上受益於中國，安全上卻與中國存在矛盾；安全上受益於美國，但經濟上卻受到美國打壓，美韓同盟存在結構性矛盾。^[16]總體上，韓國對中國崛起的適應度要高於日本，韓日的對華戰略選擇存在差異。

（二）從“非對稱”到“對稱”引發的日韓對立情緒

布蘭特利·沃馬克（Brantly Womack）指出，在多邊層面上，非對稱決定了國際關係中不確定性與彼此關注的模式。^[17]日韓關係之間存在著結構性變革，日韓關係由日強韓弱發展為彼此對等的“水平關係”。首先就是國力的對比，從不對

等到更加對等；其次在經濟和安全方面，從互補到更具競爭性；再次就是在兩個國家的內政方面，國內政治方面民主化和民粹化趨勢明顯。

尹錫悅在總統選舉中以微弱優勢獲勝會成為其未來執政的政治負擔。2024年4月韓國國會議員選舉以泛在野黨陣營192席的巨大勝利結束，第22屆國會仍維持“朝小野大”的局面，在目前共同民主黨多數席位的情況下，執政黨不得不與在野黨進行協商。如果在野黨在參政的過程中事事反對的話，尹錫悅政府的對日戰略外交也將面臨困境。韓國民眾期待在國際上受重視的程度不斷提升，日本民眾難以適應韓國因實力增長而提出的道歉要求，致使雙方在社會心理層面的對立加深。因此，儘管在尹錫悅的推動下，日韓關係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距離兩國結盟還比較遙遠，缺乏牢固的民意基礎。上述因素決定了日韓此輪關係改善仍有較大不確定性，日韓戰略性接近所產生的實際成效也將因此受到限制。

（三）歷史問題鴻溝依舊難以消解

日韓之間摩擦點依舊存在，除安全利益亦存在諸多分歧外，還有強制勞工和慰安婦的賠償問題和領土方面的爭端。雖然兩國首腦“穿梭外交”展現了解決歷史問題的積極姿態，但日本在歷史問題上依舊持傲慢態度，岸田在首腦會談中亦始終沒有在日韓歷史問題上“道歉”。其中，日韓圍繞“慰安婦”問題的解決模式及其命運具有重要的警示意義。2015年日本和韓國通過外長會談就“慰安婦”問題達成協議，但此後事態的發展顯然出乎日韓決策者們的預料，協議先在兩國國內引發批判，後以慰安婦少女像等事件為轉折點，演變為曠日持久的外交之爭，協議也未得到有效的落實。領土問題方面，韓國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議員田溶冀在岸田文雄訪問韓國前夕登上“獨

島”，日本外務省和駐韓使館分別就此事向韓國提出抗議。

歷史問題之所以成為日本與包括韓國在內的亞洲鄰國之間難以逾越的一道鴻溝，根本原因在於二戰後單獨對日占領的美國未能徹底清算二戰中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罪責，日本右翼勢力得以再次抬頭。以1951年《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為代表的片面媾和、東亞深陷冷戰結構以及美國霸權的定型等，成為日韓歷史問題至今難以徹底解決的深層原因。日本是二戰戰敗國和過錯方，但在日韓談判中始終處於優勢地位。日韓在處理“強徵勞工”與“慰安婦”問題時的歷程充分表明，未能尋求根本性解決的情況下的所謂“協議”，將隨著新形勢不斷產生新矛盾，仍可能成為影響兩國關係發展的巨大障礙。

結語

在俄烏衝突推動亞太區域陣營對抗、美國利用日韓介入亞洲事務的背景下，日韓開啓戰略性接近的新局面，兩國戰略性接近態勢今後仍有升溫、強化的趨勢。儘管“戰略性接近”在安全上的涉華消極性增強，但中日韓開展合作的必要性與可行性也在提升，日韓領導人政治決斷之下的急速戰略性接近存有隱患，特別是在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下的兩國關係仍有回擺的可能。多輪日韓首腦會談和美日韓三邊會談在達成一批合作協議同時，也留下不少未解決問題。由於長期政治對立，日韓的安全互信相當薄弱，即使美國一再推動，在可預見時期也很難構建制度化的日韓軍事同盟。總而言之，無論是日韓邦交正常化開端的“1965年體制”，還是《21世紀日韓新夥伴關係共同宣言》達成夥伴關係的“1998年高峰”，抑或是岸田和尹錫悅互訪開啓的“戰略性接近”，都未完成兩國由“臨時妥協”轉變為“徹底和解”

的歷史任務。同時，美日韓三邊“非對稱關係”和目標困境將持續影響三國關係構建，對華戰略分歧將依舊存在。日韓關係改善仍停留在戰略性接近層次，難以通向深度和解或結成同盟。●

註釋：

- [1] 「ウクライナの窮状は東アジアでも再現される可能性がある、と日本の岸田首相が警告」、ARAB NEWSJAPAN、2022年5月7日、https://www.arabnews.jp/article/japan/article_66759/。
- [2]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outh Korea hold another joint military exercise with the theme of anti submarine after 5 years.Reuters, April 3, 2023. <https://edit3-537296i8ds97116.crntt.com/world/south-korea-us-japan-hold-anti-submarine-drills-counter-north-korea-threats-2023-04-03/>。
- [3] 「米韓首脳會談「核の傘」の信頼性を確認した」、読買新聞、2022年4月28日、<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30427-OYT1T50263/>。
- [4] 外務省「アントニー・ブリンケン米國國務長官、林芳正日本國外務大臣及び樸振(パク・チン)韓國外交部長官による共同聲明」、2022年5月2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50254.pdf>。
- [5] 「日米防衛相會談 中國の挑発的な行動に懸念 対話の重要性で一致」、テレビ朝日、2023年6月1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fe604637101976233fcc7882f9ca2549597a52ca>。
- [6] 「NATO、日本に拠點 來年、対中口にらみ サイバー協力深化」、日本經濟新聞、2023年5月4日、<https://edit3-537296i8ds36429.crntt.com/article/DGKKZO70741780U3A500C2MM8000/>。
- [7] 日韓首脳會談で安保協力強化へ「悪循環断つ」と尹大統領、共同通信、2023年3月15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c921b431efd6a5fbbadb4145db197db4171d49af>。
- [8] 日本外務省「岸田内閣総理大臣の韓國訪問」、2023年5月2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_o/na/kr/page1_001653.html。
- [9] 日本外務省「日韓首脳會談」、2023年5月7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_o/na/kr/page6_000851_00001.html。
- [10] The Spirit of Camp David: Joint Statement of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ugust 18,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8/18/the-spirit-of-camp-david-joint-statement-of-japan-the-republic-of-korea-and-the-united-states/>。
- [11] 日本防衛省「韓國海軍艦艇による火器管制レーダー照射事案」、2018年12月20日。<https://www.mod.go.jp/j/surround/radar/index.html>。
- [12] 日本外務省「14回日韓次官戦略対話の開催」、2023年10月5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1_001568.html。
- [13] 日本外務省「日米韓インド太平洋対話の開催(結果)」、2024年1月9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it_000001_00184.html。
- [14] 中國政府網：《李強出席第九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https://edit3-537296i8ds41154.crntt.com/yaowen/tupian/202405/content_6953858.htm。
- [15] Victor D. Cha, 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The United State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 p.42.
- [16] 「日韓の戰略的關係再構築への提言 一自由で開かれた北東アジア經濟圏にむけて一」、平和政策研究所、2022年9月26日。<https://ippjapan.org/archives/7063>。
- [17] 布蘭特利·沃馬克：《非對稱與國際關係》，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第53頁。

(作者簡介：孫家坤，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張勇，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員)